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分析

林彰平^{1,2}, 闫小培³

(1.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广州 510006; 2.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 广州 510006;

3.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摘要: 以广州市 1984 年第三产业普查数据和 1996 年、2001 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来源, 结合其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 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对比、评估和解释方法, 对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过程及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①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向城市新区扩散和向城市中心区集聚并存, “集中于越秀”的初始空间格局变为“中心区多点集聚”的现状空间格局, 金融服务业集聚地段的生成表现为一个的“由南而北、由西往东”时空运动过程。② 社会经济体制和金融管理体制转型、金融机构行为变化以及城市空间扩张分别是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前提条件、微观基础和空间张力; 城市化集聚经济效益促进各区金融服务业差异化增长, 递次集中兴建的城市办公活动空间吸引金融机构在城市特定地段集聚。③ 研究时段内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缺少西方国家城市那样的高端金融服务总部集聚中心, 也没有观察到西方大都市 CBD 衰退现象和金融服务“废弃型”城市空间。

关键词: 金融服务业; 空间格局; 变动; 广州市

1 引言

无论是实体层面还是抽象层面, 相对于金融的时间性, 其空间性要弱得多^[1,2], 加之中世纪以来“一国一币”的封闭、静态传统货币空间模式, 阻碍了区域经济学持续深入地进行金融空间维度研究, 一直以来金融地理也没有能够成为经济地理学家广泛的研究领域^[3-5], 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甚至出现了“地理终结”的过激命题^[6]。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的演化, 以及 1945 年以后西方经济系统所呈现的大规模服务化, 金融服务的空间维度成为了关注重点, 金融地理研究出现了研究尺度多层次化、研究方法多样化的特点, 由最初的景观分析(区位分析)、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转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化制度取向^[7-13]。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注重在全球尺度对货币金融霸权进行分析^[14-19], 对金融地理现象进行政治经济学理解, 关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金融成因^[20-25]。近期西方学者更多地从服务功能角度对金融地理进行研究, 除了继续加强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 更重视区域和城市层面零售金融和服务机构空间组织结构的研究。如伊列拉斯将包含金融服务在内的服务活动区位模式概括为“(中心地理论)修正后的服务等级”, 认为许多服务并非就近购买^[26]。莱申等人的研究认为, 英国银行业体系同时发生了空间专业化和区域总部职能的中心化^[27]; 可以分辨出两种理想化的零售金融服务生态和网络, 即中产阶级所居住的郊区所代表的当代具有特权的零售金融服务市场生态和网络以及贫困的内城地区、边缘的地方当局房地产构成的“废弃型”生态^[28]。帕尔和巴德将修正后的中心地模型应用于英国金融服务业空间组织研究, 发现金融服务活动按依次包含的等级结构进

收稿日期: 2005-12-22; 修订日期: 2006-04-12

基金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0125003);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Foundation: The National Science Fund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No. 40125003; Project of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of Guangzhou]

作者简介: 林彰平(1966-), 男, 湖南邵阳人, 博士, 副教授。主要从事服务业地理研究。E-mail: zpling222@163.com

行组织^[29]。希尔姆和阿尔韦涅对巴黎 17 种高端服务业区位模式的研究发现，金融服务业全球总部功能区位仅限于中央巴黎，专门为地方商务服务的分支机构位于巴黎和较大的次中心，定位于消费服务的小分支机构则分散在整个区域^[30]。沃纳赫姆和夏普的研究说明社会经济基础对包含金融服务业在内的高端服务业产生了空间约束或刚性^[31]。科菲和希尔姆对 1981~1996 年间蒙特利尔地区包括金融服务业在内的高端服务业在都市区内部的地理变动研究发现，中央商务区 (CBD) 处于相对而非绝对的衰退，分散也是趋于多中心而非总体扩散，尽管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集聚经济继续对都市区内部的区位活动产生影响^[32]。此外，集群理论和参与者网络理论 (ANT, actor-network theory) 也被引入到金融服务业地理研究中^[33, 34]。显然，西方学者以金融活动密集的城市空间作为货币金融地理研究永恒的经验来源地和理论试验场，采取结构分析与关系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突出制度文化解释与网络分析，得出了基于西方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组织结构、金融服务活动与城市空间序列的某种依存关系。但是，由于体制和文化的差异，基于西方国家案例的研究成果未必能解释转型期中国城市与区域金融服务业地理现象。

中国地理学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认为，中心地理论、地租理论、集聚理论以及公平性与效率性兼顾原则可以作为分析生产者服务业区位的理论基础^[35]；体制转型期中国城市的空间格局受市场经济和政府管制双重制约的影响较西方城市更为明显，办公机构未高度集中于传统 CBD 或新 CBD^[36]；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基本经济活动功能，表现出了外向功能特征^[37]。

中国对各层次金融中心和区域金融的已有地理学研究，基本上采取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和金融发展理论的金融结构分析法，研究尺度以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省级行政区及经济中心城市间的比较为主，研究重点和方法未显露出与经济学的显著差别，缺少从服务功能角度针对金融体系和金融组织空间维度方面的研究，无法体现地理学科研究金融服务业空间问题的特色与优势。近期中国地理学界以评介西方金融地理学成果为先导积极进行金融空间维度研究，并在短时间内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成果^[38-42]，预示着研究视角和方法与西方金融服务业研究接轨的趋势，但未见关于城市内部空间尺度金融地理实证研究成果的报道。

关于广州市服务业的已有实证研究缺少对金融服务业空间维度的专题研究，研究时段也相对较短，所以仅部分地反映了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特征：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前，广州市“条状”金融保险业集中分布区就已经形成，以沿江路为轴线分布于 12、13 和 14 邮区，但没有进入 CBD 硬核心区^[43]；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金融与旅馆功能比较突出、呈“线状”空间结构的“环市东路”CBD 分区得以形成^[44]。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广东省被国家批准成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改革开放先行区。在 20 多年的转型进程中，广州市一直发挥着华南区域金融中心的功能，金融体制改革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金融实践成效显著。当前，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发展战略又重新被提上了市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付诸实质行动。因此，以广州市作为典型地区，分析城市内部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及其原因，不仅对丰富国内金融地理研究空间尺度和实证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而且研究结论还将对理解转型期中国沿海大都市金融服务业空间变动规律、从而指导金融服务业发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1)普查资料、地方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和方志。主要

有, ①广州市第三产业普查办公室编《广州市第三产业普查资料汇编》(1985); ②广州市基本单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州市基本单位普查资料 1996》(1997); ③广州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广州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汇编》(2003); ④广东省基本单位普查办公室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广东省法人单位全新纪录(社会服务卷)》(2003); ⑤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广东省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汇编·广州卷》(2002); ⑥广州市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广州统计年鉴 2002》; ⑦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金融志》、《广州市志·城市建设志》(1999); ⑧广州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年鉴 1986》。(2) 金融管理部门提供数据, 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提供的金融机构名录资料(电子版)。(3) 实地调查获得数据。主要是对金融机构集中分布地段进行实地调查, 获取必要的空间数据。

2.2 研究方法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比较法。选取表征金融服务业规模、效益的金融服务基本单位(机构网点)、法人单位(机构), 从业人数, 法人单位实收资本, 增加值, 营业收入等指标, 对金融服务业空间分布进行转型初期(1984年)、1996年、2001年和现状(2004年)的对比分析, 反映广州地区、广州市区以及市区内金融服务机构集中地段等空间尺度的格局变化。

对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原因的分析采用了定性解释和定量评价方法, 其中定量评价方法主要是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法。以广州市的 12 个区(县、市)为空间单元, 选择法人单位密度(V_1)、人口密度(V_2)、投资强度(单位面积固定资产投资额)(V_3)、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审计、统计咨询业单位密度(V_4)、实收资本 5000 万元以上企业法人单位密度(V_5)、年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上企业法人单位密度(V_6)、国家机关法人单位密度(V_7)、人均 GDP(V_8)、职工人均工资(V_9)、法人单位 2001 年比 1996 年增减率(V_{10})以及从业人员 2001 年比 1996 年增减率(V_{11})等 11 项构成金融服务业发展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指标, 从以上数据源获取所需数据, 建立数据库, 利用 SPSS 统计软件对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发展社会经济环境进行定量评价。具体分析步骤为: (1) 共同度分析。在对变量(11 项评价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 消除量纲影响之后, 继续进行评价指标内部结构分析。结果说明, 评价指标满足主成分分析的基本要求。(2) 方差分析。萃取 3 个主成分并经方差极大值旋转后, 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58.79%、16.51%和 15.68%, 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了 90.987%, 说明 3 个主成分能够解释 11 个评价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3) 载荷分析与主成分命名。根据初始变量在主成分上的载荷系数, 归纳主成分的构成并命名。第一主成分由 V_1 、 V_2 、 V_3 、 V_4 、 V_5 、 V_6 和 V_7 等指标构成, 命名为金融服务市场规模和产业支持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由 V_8 和 V_9 两项指标构成, 命名为金融服务需求能力主成分; 第三主成分由 V_{10} 和 V_{11} 两项指标构成, 命名为金融服务需求趋势主成分。(4) 聚类分析。采用层次聚类法, 以主成分作为新变量对 12 个空间单元进行聚类, 得到 6 种类型。(5) 单因素方差分析。以主成分为观察变量, 6 种金融服务业发展社会经济环境类型为控制变量, 可以得到每一类型 3 个主成分的得分。(6) 计算综合特征得分。以主成分分析过程中得到的各区(县级市)各主成分得分乘以相应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 加总得到各区(县级市)金融服务业发展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特征得分。

3 结果与分析

3.1 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

3.1.1 “城乡差异悬殊, 高度集中于越秀区”的初始空间格局 首先, 从全广州地区范围看, 金融服务业主要分布于广州市区。根据广州市第三产业普查办公室的“广州市第

三产业普查资料汇编(1985)”的基础数据,1984年广州市包括市区(东山区、海珠区、荔湾区、越秀区、黄埔区、天河区和芳村区)和8县(花县、从化县、番禺县、增城县、龙门县、新丰县、清远县和佛冈县)。1984年末广州市区金融保险业劳动者人数、固定资产净额和增加值分别为10361人,4583万元和37813万元,占全地区比重分别为69.5%、73.3%和94.4%。

其次,从广州市区范围看,第三产业和金融保险业集中分布于荔湾区、越秀区和东山区。荔湾、越秀和东山三区合计,1984年末第三产业劳动者人数、期末固定资产净额和增加值分别为503280人、340677万元和246681万元,占全地区的比重分别为47.6%、46.3%和65%,占全市的比重分别为63.6%、50.6%和71.4%。金融保险业劳动者人数、期末固定资产净额和增加值分别为10294人、4577万元和37772万元,占全地区的比重分别为69.1%、73.2%和94.3%,占全市区的比重分别为99.4%、99.9%和99.9%。

第三,在城市老中心区内部,金融保险业高度集中于越秀区。1984年末越秀区第三产业劳动者人数、期末固定资产净额和增加值分别为208599人、85125万元和99718万元,分别占荔湾、越秀和东山三区之和的41.4%、25%和40.4%;1984年末越秀区金融服务业劳动者人数、期末固定资产净额和增加值分别为8058人、3160万元和27745万元,分别占荔湾、越秀和东山三区之和的78.3%、69%和73.5%。可见,金融服务业集中于越秀区的程度大于第三产业整体。

3.1.2 “中心区多点集聚,边缘县级市相对落后”的现状整体空间格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发生了以下三方面变化:第一、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空间集中的范围扩大。1984~1996年间,广州市市域范围金融服务业空间分布总体上是资本集中于城市老中心区的程度增大,天河区、海珠区、黄埔区和番禺区金融服务业的成长造成了市区范围内金融服务业从业人员和产出向更大范围分散。1996年荔湾、越秀和东山三区金融保险业基本单位从业人员数占全广州市的52.4%,与1984年相比,降低了16.7%,三个区金融保险业基本单位从业人员数占老八区(指1984年第三产业普查时的市区范围,即越秀区、荔湾区、东山区、海珠区、黄埔区、芳村区、天河区和白云区)的63.8%,比1984年下降了35.6%。1996年荔湾区、越秀区和东山区三区金融保险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占全广州市和老八区的比重分别为93.1%和94.9%,分别比1984年上升19.9%和下降5%(表1)。

第二、1996~2001年,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及营业收入规模发生了空间上不均等的增减。天河区、海珠区和东山区金融保险业基本单位显著增加,相反,芳村区和黄埔区以及增城市、从化市两个县级市出现了减少。全市金融保险业基本单位(机构网点)数量增加了241个,天河区、海珠区和东山区的增加率分别为75.56%、27.43%和26.27%;芳村和黄埔两个城区以及增城市、从化市两个县级市按减少率由大至小排列依次是:增城市28.5%,从化市23.23%,黄埔区14.05%,芳村区8.54%。从业人员增减差异的基本情况则是芳村和荔湾区两个城区比增城市、从化市两个县级市以及黄埔区、越秀区的降幅大,分别达到了39.17%和30.84%。2001年全市金融服务业年营业收入比1996年增加了10.91%,增加幅度最大的区是天河区和东山区,分别增长了163.34%和139.61%,从化市、越秀区和增城市分别是降幅最明显的三个区、市,分别降低了54.13%、45.81%和30.77%(表1)。

第三、金融机构不断向城市中心以外地区分设,同时城市中心区金融服务业地位不断提高。2001年全市金融保险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比1996年减少119.63亿元,主要是越秀区、黄埔区、番禺区和增城市的减少造成的,它们分别减少了88.23%、42.03%、15.04%和55.1%。东山区和天河区增长幅度最大,分别增长了380%和165.4%。无论是金

表 1 1996~2001年广州市金融保险业空间分布变动

Tab.1 The variation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industry in Guangzhou, 1996-2001

		全市	东山区	荔湾区	越秀区	海珠区	天河区	芳村区	白云区	黄埔区	番禺区	花都区	增城市	从化市
1996	基本单位数 (个)	2613	303	130	184	175	180	82	321	121	521	206	235	155
	法人单位数 (个)	510	137	27	71	30	42	12	28	25	54	24	31	29
	基本单位从业人员 (人)	52392	11829	3488	12128	3646	5116	1353	2784	2642	4733	2101	2427	1590
	法人单位实收资本 (万元)	6538099	805641	5921	5275511	11823	228911	4447	36385	44601	71745	13127	31285	8682
	营业收入 (万元)	4865654	875640	130233	2494101	248369	333912	49766	140052	149666	240558	66074	83542	53741
	基本单位分布密度 (个/10 ² km ²)	35	1761	1102	2067	193	166	192	31	99	40	21	13	8
2001	基本单位数 (个)	2854	383	153	213	223	316	75	340	104	540	220	168	119
	法人单位数 (个)	510	125	18	68	24	86	9	32	16	50	26	28	28
	基本单位从业人员 (人)	77350	26626	2736	12219	3544	12132	1068	3800	2136	6247	2886	2617	1632
	法人单位实收资本 (万元)	5341818	3867870	15457.1	621168.8	17679.5	607517	4488.7	79485.5	25855	60953.2	17643.4	14037	9662.9
	营业收入 (万元)	5396305	2098140	127740	1351655	176823	879338	34219	171555	128304	284116	62123	57838	24651
	基本单位分布密度 (个/10 ² km ²)	38	2227	1297	2393	246	292	176	29	85	41	23	10	6
2001	基本单位数 (个)	27	70	18	57	16	38	14	13	21	12	13	16	14
	法人单位数 (个)	241	80	23	29	48	136	-7	19	-17	19	14	-67	-36
	基本单位从业人员 (人)	0	-12	-9	-3	-6	44	-3	4	-9	-4	2	-3	-1
	基本单位数 (个)	24958	14797	-752	91	-102	7016	-285	1016	-506	1514	785	190	42
	法人单位实收资本 (万元)	-1196281	3062209	9536.1	-4654342	5856.5	378606	41.7	43100.5	-18746	-10792	4516.4	-17248	980.9
	营业收入 (万元)	530851	1222500	-2493	-1142446	-71546	545426	-15547	31503	-21362	43558	-3951	-25704	-29090
1996	基本单位分布密度 (个/10 ² km ²)	3	466	195	326	53	126	-16	-2	-14	1	2	-3	-2
	基本单位规模 (人/个)	7	31	-9	-9	-5	10	-3	4	0	3	3	6	4

资料来源: 1996年基础数据来自: 广州市基本单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广州市基本单位普查资料1996, 1997, 2001年基础数据来自广州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广州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汇编,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融服务业机构网点、从业人员、全年营业收入, 还是实收资本, 两个县级市都表现为减少, 减少率分别为 26.41%、10.53%、39.91%和 40.7%。整体来看, 市区融服务业机构网点、从业人员和全年营业收入三项分别增加 15.38%、42.54%和 12.39%, 只有实收资本减少 18.2% (表 1)。

3.1.3 “由南而北, 由西往东”的金融机构相对集中地段形成时空过程 广州市的金融机构, 尤其是区域性分行和公司总部主要相对集中于四个地段 (图 1): (1) 越秀区人民南街道沿江西路、长堤大马路银行机构集中地段。该地段面积约 8 万 m², 从 1924 年 8 月 15 日国民党中央银行在南堤 (今沿江中路 193 号) 宣告成立之时起, 这里便是区域金融管理中心所在。2003 年这里集中了以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 以金融监管及专司辖属机构管理职能的机构为主体的 12 家银行机构 (不含储蓄网点, 基础数据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提供的金融机构名录资料及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省基本单位普查办公室. 广东省法人单位全新纪录 (社会服务卷).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2003. 其他地段同此)。(2) 越秀区流花路、东风西路金融机构集中地段。该地段位于人民北路、解放北路、东风西路和流花路之间约 70 万 m² 的范围之内, 以商业银行地区分支行、外资金融机构和证券、投资金融机构为主, 其中分行 (分公司) 以上机构共 13 家以及支行 (支公司) 17 家。(3) 东山区环市东地段。该地段包括环市东路麓湖路至区庄立交之间约 1.5km 长沿路两侧约 30 万 m² 范围, 集中了以证券投资、外资银行为主的分行 (分公司) 以上金融机构 30 家以及支行 (支公司) 23 家。(4) 天河区天河北地段。该地段包括沿天河北路、体育西路、体育东路两侧, 呈 “U” 形, 面积约 130 万 m²。这里集中了以外资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为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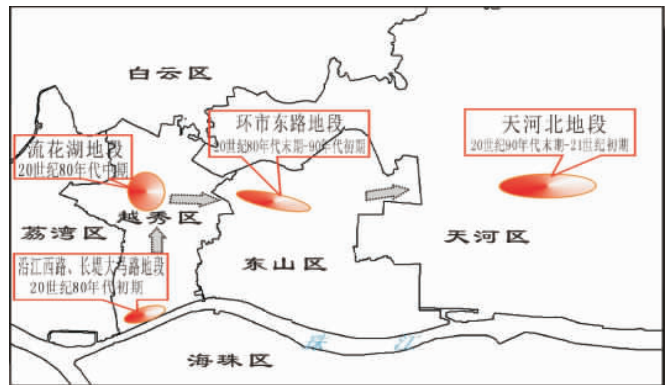


图 1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机构相对集中地段形成的时空过程
Fig. 1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merging progres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gglomerative zones in Guangzhou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分行以上银行机构 11 家，分公司以上证券投资公司 15 家和保险公司 7 家，支行（分公司）28 家。

越秀区沿江西路和长堤大马路地段作为金融机构集聚地段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已定型。根据广州年鉴编纂委员会的“广州年鉴（1986）”，80 年代初期外资银行纷纷试探性地在流花湖地区设立办事处，在广州市对外贸易中心增加了 16 家体制外的金融机构，并吸引部分国有金融机构（如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向这一地区移动，至 80 年代中期越秀区流花路、东风西路成为了广州市第二个金融机构集中地段。1980~1990 年之间的环市东地区房地产建设高潮，形成了新的办公活动空间，成为了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外资银行区位的首选地。天河北地区直到 90 年代末期才成为受金融机构青睐的办公活动空间。

3.2 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原因

3.2.1 金融企业市场化取向的组织创新和空间行为变化是空间格局变动的微观基础 20 世纪 80 年代初广州市金融机构体系的特点是“银行业独大、国有金融独尊”。1980 年广州市共有金融机构 419 个，其中 400 个属于市农业银行和人民银行。经过金融体制改革，广州市金融机构体系逐渐转变为目前由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监督、调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分离，多种金融机构和融资形式并存、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体系。根据 2003 年广州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广州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汇编”数据，2001 年广州市金融保险业法人单位中保险业占 12.94%，金融业占 87.06%。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信托投资业和证券经纪与交易业的法人单位分别占金融业的 0.9%、48.2%、23.9%、12.6%和 6.3%。在金融保险业经济类型构成中，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外商经济和私营经济分别占 58.1%、38%、0.8%和 1.2%，其他经济类型占到 9.1%。

与转型初期的金融机构体系相对应的金融服务机构组织结构具有显著的行政科层组织结构特点^[45]，在空间行为上首先表现为基本上按照行政区划布局机构，分支机构等级严格地与行政区域的管辖权对应；其次作为财政的簿记中心，金融依附于财政，服务于政府部门，而忽视企业和居民部门的服务需求。在“三级管理、一级经营”的经营管理体制下，管理权集中在地市级以上机构，地市级以下机构仅仅是直接业务经营单位。越秀区历来是各级政府管理机关集中地，所以“集中于越秀”的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初始空间格局既是历史继承的结果，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

国有商业性金融机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金融服务市场的渐次开放，带来了金融机构行为的变化。国有金融机构日益重视企业和居民部门的金融服务需求，而体制外生成的金融机构在城市老中心区无既得利益，更倾向于为城市新区提供金融服务，以避免在城市老中心区与国有金融机构展开激烈竞争，降低经营成本。这样，金融机构集中分布地段就由“单点”变为“多点”并存。

受外资金融机构组织模式及其盯住高端客户营销策略的启发，国有金融服务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开展了扁平化取向的组织创新。国有商业银行广东省分行与广州市分行的合并以及支行以下网点的撤并、升格、业务综合化使国有商业银行的层级从 5 级减少到 4 级，进而朝着中国人民银行所设想的 3 级模式（分行—支行—营业网点）发展。以某国有商业银行广州市分行的调查为例（因涉及企业商业机密，不便公开被调查机构的名称），从 1999 年至 2004 年，共撤并了 279 个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其中大部分位于经营状况不佳的荔湾区、芳村区及市辖县（市），新设立的 17 个二级支行，都分布于天河区、黄埔区和开发区。网点布局行为的变化是造成前述广州市各区（市）金融服务业不均等增减的重要原因。

此外，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变革服务递送方式，通过现金管理系统实现与高端客户的单点联系以及综合业务跨区提供等因素也是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现状空间格局得以形成的

原因。

3.2.2 城市规划调控下的城市空间扩张是金融服务业重心不断东移的空间张力 20世纪80年代以后,广州市的新上工业项目,主要放在芳村、白云、天河和黄埔四个新区以及县级市,并且主要沿珠江和主要交通干线两旁分布,其中珠江和广深铁路、广深公路为东西向的主轴线,辅以广发、广从两条支线。1984~1996年间,广州市工业企业单位数从3 410户增加至19 258户,增幅达4.6倍,但老城区工业企业单位占全市的比重减少了28.8个百分点,新区和县级市则分别增加了16.3和12.5个百分点,至2001年,老城区工业企业占全市比重又下降了6个百分点,新区和县级市则都上升了3个百分点(基础数据来源:广州市基本单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州市第一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1997.广州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州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为了便于纵向比较,花都区 and 番禺区仍旧记入县市一类)。1979~1992年之间天河区、白云区、芳村区和黄埔区用于开发居住区的土地达377.83万 m^2 ,建设各种房屋达1 146.85万 m^2 ,约占同期广州市居住小区(旧城改造以外)总数的60%。4个新区居住区开发土地中天河区和黄埔区分别占75.1%和3.2%(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城市建设志》.262.)。因此,由老城区向东是转型期广州市最主要的城市空间扩展方向,包括工业项目用地开发和居住小区开发在内的新区开发构成了广州市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内容。

2000年6月番禺、花都撤市设区,广州市市区面积由原来的1 443.6 km^2 增加到3 718.5 km^2 ,行政区划的调整为广州城市空间的拓展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概念规划提出了促使城市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和“东进、南拓、北优、西联”的空间发展方针,明确了东、南是广州市中心城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与城市空间扩展策略与方向相伴的是金融服务业显著的向东、南两个方向的扩散运动,主要是天河区、海珠区金融服务业相对地位的提升,表现为金融服务机构、人员、实收资本和营业收入的显著增加。

3.2.3 金融服务业发展环境对金融服务业产生差异化吸引作用和集聚效应 金融机构网点倾向于在体量大、房龄低、设施新的楼盘或写字楼、商场驻扎。广州市高层建筑第次在不同地段集中兴建,不仅使城市三维空间形态发生了分异,而且影响了金融机构和网点的分布。1990年所有15层以上高层建筑都分布在广州大道以西的老城区。1990~2000年高层建筑空间分布的显著变化就是环市东路地段18层以上建筑密度加大,新城市中心河北地段出现了18层以上建筑扎堆现象^[46],这两个地段相继成为新的金融机构集聚地。

20世纪90年代广州市商品写字楼的开发是新办公活动空间的主要来源。1993~1998年天河区、东山区和越秀区批出的写字楼预售面积分别为120.59万 m^2 、107.94万 m^2 和80.79万 m^2 ,分别占同期广州市写字楼批出预售量的32.8%、29.3%和22%,三区合计共占广州市的84.8%。天河、东山和越秀区成为了新办公空间集中分布区域^[47],从而强化了对金融机构选址的吸引力。

计算结果显示,广州市各区(市)金融服务业发展社会经济环境综合特征得分由高至低排列依次是,东山区、越秀区、黄埔区、番禺区、荔湾区、从化市、天河区、白云区、花都区、增城市、芳村区和海珠区(图2)。不考虑金融服务业区际交流的话,金融服务业发展社会经济环境与金融服务业业绩之间显著正相关,说明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发挥了作用。但是,各区金融服务业业绩与发展环境综合特征得分之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海珠区、天河区、芳村区、越秀区和荔湾区金融保险业企业法人单位年人均营业额分别比各自金融服务业发展环境综合特征得分高出5、4、2、1和1个位次;从化市、黄埔区、增城市、花都区、番禺区和东山区金融保险业企业法人单位年人均营业额分别比各

自金融服务业发展环境综合特征得分低 1、1、1、1、3 和 6 个位次；只有白云区金融保险业企业法人单位年人均营业额与金融服务业发展环境综合特征得分的位次相同(图 2)。

造成以上结果的原因是，金融体制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以及金融服务产品的差异使金融服务跨区提供和消费成为现实，尤其是城市中心区满足了边缘区的大量金融服务需求，所以城市新老中心区金融服务业发展实际业绩位次优于本区金融服务业发展环境位次。实地调查得知，2001 年广州开发区内有金融保险业基本单位 64 个，但是基础设施建设及企业投资、运行的融资活动大部分发生于区外，很多公司在广州市中心城区还设立了办事处，便利企业获得中心城区金融服务机构及其辅助行业提供的差异化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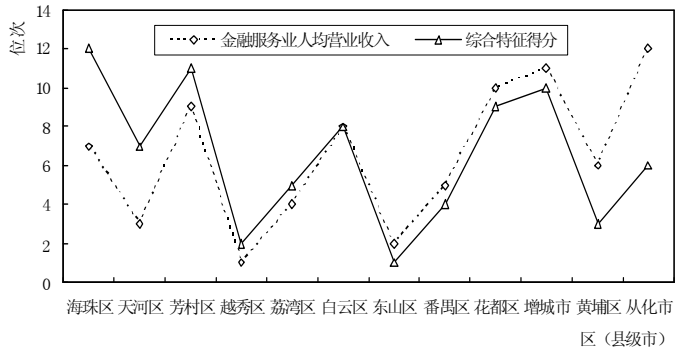


图 2 金融服务业发展业绩与环境位次

Fig. 2 The performance and environment rank of financial service

4 结论与讨论

(1)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向城市新区扩散与向城市中心区集聚相伴。在城乡金融服务业差异悬殊局面的基础上，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在城区多点集聚，中心城区的金融服务业地位得到了强化，有别于转型初期全市金融服务业集中于越秀区沿江西路、长堤大马路地段的局面，呈现出新老城市中心区四个金融机构集聚地段并存的现状空间格局。金融服务业扩散则以东、南方向为主。

(2)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经济体制和金融管理转型是前提条件，相应的金融机构行为变化是微观基础；城市发展战略主导下的城市空间扩张是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的重要空间张力；社会经济发展空间差异通过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促进各区金融服务业差异化增长，递次集中兴建的城市办公活动空间更吸引金融机构在特定地段微观集聚。

(3) 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西方国家城市不同的是，一是转型期广州市没有形成高端金融服务集聚程度特别高的主中心，像巴黎那样呈现“高端服务业总部—专门分支机构—消费服务小分支机构”与“主中心—次中心—区域”的严格的层级对应关系，地方化集聚经济效应不明显；二是未像蒙特利尔地区那样发生了中央商务区的明显衰退；三是广州老中心区荔湾区金融服务业业绩下降，但也没有成为类似于英国内城区“废弃型”生态的城市空间。与西方城市的相似之处在于，一是金融服务业向城市新区扩散与向城市中心区集聚并存；二是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引致了各区(县、市)金融服务业的差异化增长；三是现状空间集聚地段之间没有明显等级关系，金融服务和产品跨区提供，金融服务具有外向功能特征等方面说明，需要对“中心地理论”进行必要的修正才能正确反映金融服务业的区位模式。

(4) 由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与城市空间发展的显著关联可以推断，第一，广州市金融服务以本地业务为主，这与伦敦、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以国际金融业务为主、金融服务业和本地制造业弱相关的情形相差甚远，这是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发展的现实基础；

为实现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广州市需要进行整体功能构架的转型,能够充分发挥地方化集聚经济效应的高端金融服务集群化应是提升金融服务功能和金融服务业竞争力的战略选择。第二,新区开发和产业扩散既促进金融服务业扩散、引致金融服务市场拓展,又有益于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产品的金融机构在城市特定地段集聚,促进商务活动的集中,所以,规划建设广州珠江新城“21世纪城市CBD”不仅要依靠现代化城市办公活动空间的建设和相关产业的集中,而且还要依靠某些产业或产业环节的扩散。

(5)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发展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面临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电子化的挑战,也处于国家、大珠江三角洲空间层面的竞争与合作环境之中。限于篇幅,将另文论述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外部空间动力以及金融机构微观集聚机理。

致谢:林彰平获中山大学凯思奖学金资助赴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环境管理研究中心访问期间,合作导师叶嘉安教授对本研究提出了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Jiang Chun. On the substance and institutional presupposition of finance.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999, (7): 33-39. [江春. 论金融的实质及制度前提. *经济研究*, 1999, (7): 33-39.]
- [2] Sumuelson P A, Nordhaus W D. *Economics* (Chinese Edition). Beijing: Posts & Telecom Press, 2001. 420. [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 *经济学* (中译本).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1. 420.(肖琛主译)]
- [3] Martin R.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of money. In: Martin R (ed.). *Money and the Space Economy*.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1999.3-27.
- [4] Cohen, B. J. *The Geography of Money*.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5] Laulajainen, R. *Financial Geography* (Chinese Edi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瑞斯托·劳拉詹南. *金融地理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孟晓晨 等译)]
- [6] O'Brien R. *Glob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The End of Geograph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 1992.
- [7] Caskey, J P. Bringing unbanked households into the banking system. Centre on Urban and Metropolitan Polic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2002.
- [8] Ford J, Rowlingson K. Low-income households and credit: exclusion, preference, and inclus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96, 28: 1345-1360.
- [9] Leyshon A. Geographies of money and finance III.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8, 22: 433-446.
- [10] Kennickell A B et al. Recent changes in the US family finances: results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2000, 86: 1-9.
- [11] Argent N. A global model or a scaled-down version?: geographies of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the Australian retail banking sector. *Geoforum*, 2002, 33: 315-334.
- [12] Leyshon A, Thrift N, Pratt J. Reading financial services: texts, consumers, and financial literac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98, 16: 29-55.
- [13] Thrift N.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the case of the city of London. In: Corbridge S, Martin R, Thrift N (eds). *Money, Power and Space*.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4.
- [14] Kindleberger C P.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3.
- [15] Gill S, Law 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8.
- [16] Underhill G R D. Introduction: conceptualising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In: Stubbs R, Underhill G R D (eds.),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4, 17-44.
- [17] Arrighi, G.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erso, 1994.
- [18] Cain P J, Hopkins A G. *British Imperialism: 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London: Longman, 1993. 1668-1914.
- [19] Cain P J, Hopkins A. G. *British Imperialism: Crisis and Deconstruction*. London: Longman, 1993. 1914-1990.
- [20] Harvey 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 [21] Harvey D, Chaterjee L. Absolute rent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space by governmental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tipode*, 1973, 6: 22-36.
- [22]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 [23] Harvey D. 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 In: Gregory D, Urry J (ed.),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London: Macmillan, 1985. 128-163.

- [24]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89.
- [25] Harvey D. The Urban Experience. Oxford: Blackwell, 1989.
- [26] Illeris S. The Service Economy.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1996.
- [27] Leyshon A, Thrift N. Money/Space Geographies of Monetary Transform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28] Leyshon A et al. Towards an ecology of retail financial services: understanding the persistence of door-to-door credit and insurance provider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4, 36: 625-645.
- [29] Parr J B, Budd L.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urban system: an exploration. *Urban Studies*, 2000, 37(3): 593-610.
- [30] Shearmur R, Alvergne C. Intrametropolitan patterns of high-order business service lo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venteen sectors in Ile-de-France. *Urban Studies*, 2002, 39(7): 1143-1163.
- [31] Wernerheim C M, Sharpe C A. 'High order' producer services in metropolitan Canada: how footloose are they? *Regional Studies*, 2003, 37: 469-490.
- [32] Coffey W J, Shearmur R G.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of high-order service employment in the Montreal metropolitan region, 1981-96. *Urban Studies*, 2002, 39(3): 359-378.
- [33] Taylor P et al. Financial services cluster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London. <http://lut.ac.uk/departments/gy/gawc/publicat1.html>. 2003.
- [34] Thrift N. A phantom state? In: Leyshon A, Thrift N (eds.), *Money/Space: Geographies of Monetary Transform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35] Zhang Wenzhong. A study of metropolitan service industry location theory and substanti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1999, 18(3): 273-281. [张文忠. 大城市服务业区位理论及其实证研究. *地理研究*, 1999, 18(3): 273-281.]
- [36] Ning Yuemin. The study on loc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ervice and the office building in Shanghai.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0, 24(8): 9-20. [宁越敏. 上海市区生产服务业及办公楼区位研究. *城市规划*, 2000, 24(8): 9-20.]
- [37] Yan Xiaopei, Zhong Yun. Characteristics of external func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of regional centers: case of Guangzhou,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5, 25(5): 537-543. [闫小培, 钟韵. 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向功能特征研究. *地理科学*, 2005, 25(5): 537-543.]
- [38] Wu Wei, Liu Weidong, Liu Yi. Progress in financial geography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geographer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5, 24(4): 19-27. [武巍, 刘卫东, 刘毅. 西方金融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地理科学进展*, 2005, 24(4): 19-27.]
- [39] Jin Xuejun, Tian Lin. Financial geography: new developments of geography in foreign countries. *Economic Geography*, 2004, 24(6): 721-725. [金雪军, 田霖. 金融地理学: 国外地理学科研究新动向. *经济地理*, 2004, 24(6): 721-725.]
- [40] Tian Lin, Jin Xuejun. The analysis of security market potential from an angle of financial geography.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04, 13(1): 102-108. [田霖, 金雪军. 金融地理学视角下的证券市场投资潜力分析. *世界地理研究*, 2004, 13(1): 102-108.]
- [41] Chen Pinhsien.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financial geography and financial center: the role of financial communities.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04, 13(4): 1-8. [陈品先. 金融地理与金融中心的研究进展: 从专业社群运作来看. *世界地理研究*, 2004, 13(4): 1-8.]
- [42] Zhao Xiaobin, Wang Tan, Zhang Jinxi. Information flow and asymmetric as key determinants for service and financial centre development: a case on socialist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02, 22(4): 408-414. [赵晓斌, 王坦, 张晋熹. 信息流和“不对称信息”是金融与服务中心发展的决定因素: 中国案例. *经济地理*, 2002, 22(4): 408-414.]
- [43] Yan Xiaopei, Yao Yimin.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ertiary sector in Guangzhou. *Economic Geography*, 1997, 17(2): 41-48. [闫小培, 姚一民. 广州第三产业发展变化及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经济地理*, 1997, 17(2): 41-48.]
- [44] Yan Xiaopei, Zhou Chunshan, Leng Yong et al. Functional features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CBDs in Guangzh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0, 55(4): 475-486. [闫小培, 周春山, 冷勇等. 广州CBD的功能特征与空间结构. *地理学报*, 2000, 55(4): 475-486.]
- [45] Wu Jiesi. The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of the State-owned Bank in China. Beijing: China Finance Publishing House, 1996. [武捷思.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研究.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6.]
- [46] Zhou Suhong, Yan Xiaope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structure and traffic demand in Guangzh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5, 60(1): 131-142. [周素红, 闫小培. 广州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需求关系. *地理学报*, 2005, 60(1): 131-142.]
- [47] Li Hongwei. The Use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Land.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李红卫. 城市土地使用与管理.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Analysis on the Change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in Guangzhou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LIN Zhangping^{1,2}, YAN Xiaopei³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Guangzhou Development Institute,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3. Centre for Urban & Regional Studies,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institutional preconditions, behavior bas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e and urban space development have been emphasized when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urban finance during the progress of tertiarisation. The case studies on the change of spatial pattern of financial industry (SPFI) at the urban scale are scarce in China. Based on the second-hand data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census'(1984), 'the basic units census'(1996, 2001) and other social-economic statistics, and the first-hand data from field survey,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progress and causes of the change of SPFI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by using a set of combined methods, such as comparison,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oth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There are three outcomes: (1) There are two co-existing progresses of the movement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including concentrating in the central districts from periphery districts and spreading to the new districts from the central districts. The initial spatial pattern as 'highly concentrating in Yuexiu District' has transformed to the current pattern as 'multi-spot concentrating in the central districts'. The generation of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comparatively agglomerative spots showed a 'South to North, and West to East' temporal-spatial movement progress. (2) The systematic transition of social-econom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evolvement of financial regulations were the preconditions of the variation of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spatial pattern. The behavior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as the micro-behavior base. And the expansion of urban space was the spatial tensile force.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promoted the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increasing at different rate in each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office built in turn in an agglomerative form attracted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cluster at certain spots. (3) Dissimilar 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cities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e headquarters location centre of high order financial services was not exist in Guangzhou, neither obvious decline of CBD nor 'abandoned' urban space could be discerned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in Guangzhou.

Key words: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spatial pattern; change; Guangzhou